

古史辨

第六冊

羅根澤 編著

海南出版社

古史辨 第六冊

羅振澤編

沈兼士題

周衰文弊，諸子爭鳴，蓋在夫子既沒，微言絕而大義之已乖也。然而諸子思以其學易天下，固將以其所謂道者，爭天下之莫可加，而語言文字未嘗私其所出也。先民舊章，存錄而不爲識別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訓是也。（管子地圓，淮南地形，皆土訓之遺。）輯其言行，不必盡書其身所論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後事，韓非之載其李斯駁議是也。莊子讓王漁父之篇，蘇氏謂之僞託；非僞託也，爲莊氏之學者所附益爾。晏子春秋，柳氏以爲墨者之言；非以晏子爲墨，爲墨學者述晏子事以名其書，猶孟子之以告子萬章名其篇也。呂氏春秋，先儒與淮南鴻烈之解同稱，蓋謂集衆賓客而爲之，不能自命專家。斯固然矣。然呂氏淮南未嘗以集衆爲諱，如後世之掩人所長，以爲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權，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嘗不約於一律。（呂氏將爲一代之典要，劉安託於道家之支派。）斯又出於賓客之所不與也。諸子之奮起，由於道術既裂，而各以聰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於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將推衍其學術而傳之其徒焉。苟足顯其術而立其宗，而援述於前，與附衍於後者，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

——章學誠文史通義言公上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慎次之，關老又次之，惠莊終焉：其關楊之後，墨荀之間乎？

——陳師道後山集卷二十二理究

馮 序

我曾說過中國現在之史學界有三種趨勢，即信古，疑古，及釋古。就中信古一派，與其說是一種趨勢，毋寧說是一種抱殘守缺的人的殘餘勢力，大概不久即要消滅；即不消滅；對於中國將來的史學也是沒有什麼影響的。真正的史學家，對於史料，沒有不加以審查而即直信其票面價值的。

疑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審查史料。釋古一派的人所作的工夫，即是將史料融會貫通。就整個的史學說，一個歷史的完成，必須經過審查史料及融會貫通兩階段，而且必須到融會貫通的階段，歷史方能完成。但就一個歷史家的工作說，他儘可祇作此兩階段中之任何階段，或任何階段中之任何部分。任何一種的學問，對於一個人，都是太大了。一個人祇能作任何事的一部分。分工合作在任何事都須如此。由此觀點看，無論疑古釋古，都是中國史學所需要的，這其間無所謂孰輕孰重。

古史辨是中國近來疑古文獻的大成。現值第六冊出版之際，因當時頗有人以爲疑古已不合潮流者，故略述所見，希望疑古一派的人仍繼續努力，作他們的審查史料的工作。

馮友蘭

二十六年一月

張 序

羅雨亭先生編著的古史辨第四冊，彙集近人考證諸子的文章爲一編，使研究諸子的人們感到很大的便利；這一次他繼續着編著古史辨第六冊，以考據諸子者爲上編，考據老子者爲下編，所收近年考證諸子的文章又將近五十萬言。在他去年開始編這一冊的時候，約好我來寫一篇序，自覺學識謏陋，本不打算來多饒舌，不過近來我稍有一點感想，祇好乘此機會來略一陳述。

這一冊的下編是專收考據老子的文章，據羅先生說：「關於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冊的及此冊所收，就有三十五六萬言」。這個問題在近多少年來真可以說是一個聚訟不決的問題。本來學術上的懸案，到現在還沒有解決的，正不知有多少。我因此聯想到偽古文尚書一案，從宋到清，七百多年的時間，經過多少人的考證，好像大家認爲有了定讞，毫不遲疑地說是偽古文，其實擁護偽古文的也正大有人在。明末清初的陳第毛奇齡，且不說他。祇在毛氏以後，如江昱的尚書私學，王昶的尚書後案駁正，張崇蘭的古文尚書私議，趙翼的陔餘叢考，林春溥的開卷偶得，洪良品的古文尚書四種，吳光耀的古文尚書正辭，王照的表章先正正論，以及方苞，齊召南，翁方綱，王植諸家，都是擁護偽古文的。我曾遇見過贊成洪良品之說的人；錢玄同先生也說有一位「三湘人士」是相信偽古文的。看來這一案，在一方面固可說是有了定讞，在另一方面也可以說還是懸案。「證老子之偽，其事不如證偽古文尚書之易」，在現在就想有一致的意見，大家認爲解決，這自是不容易的事情。

問題的癥結自然是在有無真憑實據。攻偽古文者因爲獲得真憑實據，所以比較得到大多數的同情。毛奇齡洪良品那樣爲偽古文鳴冤，因爲沒有駁倒那些真憑實據，所以信從之者畢竟沒有多少人。現在考證老子年代問題，在主張老在孔後者，自然還需要重新提出真憑實據；在主張老在孔前者，亦未嘗不可將懷疑老子年代的所舉的證據一一駁倒，問題自有水落石出的一日。

據我所知，現在主張老在孔後者，真憑實據也未必完全舉出。即就音韻一項而論，我曾提出老子書中「離」與「知」韻爲晚出之現象。（見民一四三月學燈拙作古書辨僞方法，又見國故學討論集第二集。）我不是專門研究音韻學的，亦未敢以自信。後來聽得錢玄同先生說：「即老子書中所有韻例，亦足證其書之晚出」（參看本書頁三六八）。吾友劉盼遂先生也說：「就老子書中用韻看來，頗有晚出的嫌疑」（參看

本書頁二八〇)。但是從音韻上考老子的專文，至今尚未提出。此外當然還可以找出一些可靠的證據來供人們裁判，壁壘愈堅，自不易爲人攻破。

反之，在主張老在孔前的，儘可以將懷疑老子的所舉的證據一個一個地駁倒。例如從前梁任公先生提出「仁義」是孟子底專賣品。但「仁義」二字在左傳中對舉的已經不少；左傳寫定時期固有疑問，在與孟子同時而未受孟子若何影響之莊子亦說：「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辨」(齊物論)？可見「仁義」並非孟子底專賣品，在別人也會說的。梁先生又曾提出用「王侯」，「侯王」，「王公」，來爲老在孔後之證。在易 蠱上九有「不事王侯」，則說「王侯」，「侯王」，「王公」實不足爲老在孔後的確證。這種反證一經指出，自然可以令人信服。但在現在實在還有一些是應更加以反駁的。例如梁先生所提出的「萬乘之主」一證，在主張老子書爲老聃遺言的也還在引用，以爲「這顯然不是春秋末年所有的」(參看本書頁三九九)。這當更進一步提出反駁以免再爲人所引用，這樣子才可以釋羣疑而息羣喙。

不過我們所要注意的是：在提出一個證據與反駁一個證據的時候，最好是盡量地檢查自己所提出的證據然後再來應用，以免增加許多無謂的糾紛。「思想線索」，「文字文體」，「時代術語」，都要盡量地檢查，已經站不住的「仁義」，「侯王」，等證再不要提出來了。有的所依據的材料在本身上還有問題，如兩戴記的一些篇，——曾子問，郊特牲之類，在沒有確定其時代以前，也當謹慎地用。有的話頭，在表面看來好像相同而其含義未必相同的，例如「社會」二字，在宋儒所用的含義與現在所有的含義並不相同，不要等量齊觀。更希望的是：一方面不要立異以爲高，一方面不要什麼也「特殊」，實事求是地做去，不惟老子年代的問題，可以早有一個水落石出的日子；即如考證其他諸子，也可省去一些糾纏。

羅先生在古史辨第四冊中收了我的一篇尸子考證，一篇陸賈新語辨僞。前者是我在民十四年發表的，後來將他附入拙著穀梁真僞考；本來很想加以修正，因爲當時匆匆南下，未得更張，以至於今。羅先生的大著出版以後，在圖書評論第二卷第三期中獲讀孫次舟先生的再評古史辨第四冊一文，內容是論尸子與新語的，恰好與我的兩篇文章都有關係。孫先生的意見也是懷疑尸子與新語，與我對於這兩書懷疑的態度正相似，不過立論不大相同，又有一些誤會拙文的地方。孫先生的這一篇文章，羅先生已收入本冊，現在因爲本冊作序，不容不再略述拙見。

孫先生的這一篇的第一部份是論尸子的真僞，其(一)關於尸子人的考定，孫先生以爲「尸子似有二人」。這與我所說的：「其實拿文字時代來作證，商君的先師的尸子，與儒家的後輩的尸子，很容易見出是兩人的」(第四冊頁四三〇)，結論是一樣的。不過我是依據輯本尸子本文來作證，孫先生則說：

以意推之，尸子之年輩後于穀梁赤，故穀梁後學著穀梁傳於竹帛時，

而以其言與穀梁相次也。……穀梁魯人也，尸子亦當爲魯人。其名不可知，著書與否不可詳。此一尸子也。至于史記，別錄，暨漢書所載，當爲另一人，即商鞅之師尸佼也——非穀梁傳中之尸子。

孫先生在下文更申述其理由曰：

何以知之？考史記通例，凡古人之有著作大行于漢代者，列傳中率不論其書。……今尸子之書既在司馬遷「不論」之列，則彼漢書藝文志雜家所著錄之尸子二十篇，即爲司馬遷所不論之書，明矣。漢志本諸劉氏錄略，則史遷所不論之尸子書，亦即劉向別錄中所著錄者矣。由此以言，則史記孟荀列傳，劉向別錄，漢書古今人表，以及藝文志所言之尸子，實爲一人，即商鞅之師尸佼是也。

孫先生以爲「尸子似有二人」，這意見是對的。不過依我的拙見看來，孫先生對於穀梁傳中之尸子是「以意推之」，而斷其爲「此一尸子」，我覺得仍不如依本證來說，似比「以意推之」，稍覺妥當。孫先生以爲尸子之書在司馬遷「不論」之列，故斷定孟荀列傳，劉向別錄，漢書古今人表，以及藝文志所言之尸子，實爲一人。殊不知漢志不必與史記盡相脗合，淳于髡書亦在史遷不論之列，而漢志竟未著錄，即其一例。孫先生即據史遷「不論」，而斷定孟荀列傳所言之尸子決非孫先生所謂「著書與否不可詳」之尸子，我覺得也不如依本證來說，似比專據史遷，較爲妥當。最奇怪的是，孫先生在前面既說：

尸子之見于記載者，以穀梁傳爲最朔；其次爲史記，別錄，與漢書。

而又說：

夫穀梁傳之著竹帛也，既甚晚矣，而其所言之尸子，徒有其姓，則與史記諸書所言之尸子，當非一人。

一方面以「尸子之見于記載者，以穀梁傳爲最朔」。一方面又說「夫穀梁傳之著竹帛也，既甚晚矣」。而又即以記載之早晚判定其「莫非一人」，孫先生這樣子的說法，更是我所不得其解的。不過，我總覺得關於人的考定，還是不如依據本書來作判斷。

其（二）尸子書的流傳，孫先生對於拙文評道：「今張西堂氏以爲輯本尸子中有儒家思想，遂斷其非商鞅之師所作；又以其有貶損尸子之辭，則又疑其頗似商鞅之師之語；而結論更謂其中尚有穀梁傳尸子之思想，是殆忘却尸子之爲雜家歟？」其實我曾說：「尸子本列雜家，但我們不可以這尸子是雜家，就認爲儒家後輩的尸子就可以非聖誣孔了」（第四冊頁四三一）！我並非忘却尸子之爲雜家，但我以爲如果就儒家後輩的尸子來看，他是不當如此說的。我的原文本甚顯明，祇是孫先生沒有注意到而已。最可惜的是，孫先生一面說我忘却尸子之爲雜家，一面仍然蹈了我的覆轍，也說：

夫尸子既與公孫龍子等書同科，「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術」，

而今輯本尸子多有祖述仲尼，憲章堯舜之辭，何也？

設尸佼其人，果如今輯本之祖述仲尼，憲章堯舜者，恐商鞅不能與之共事也。

孫先生明知尸子爲雜家，且說「所謂雜家，……其書固有儒家之言」，而仍不免蹈我之覆轍，亦以「今輯本尸子多有祖述仲尼，憲章堯舜之辭」爲疑，豈孫先生亦「殆忘却尸子之爲雜家歟？」

其（三）論輯本尸子，孫先生列舉輯本尸子之「尤乖謬者」共爲八證，「以見其非尸佼之舊」。其第七第八兩證明引「張西堂曰」，是用的拙見。第一證就是蹈我之覆轍以輯本尸子中有儒家思想而斷其非商鞅之師所作，也是同于拙見的。其他孫先生所舉的五證，在我細按起來，覺其（3）（4）兩證頗有問題。孫先生的第（3）證說：

爾雅成書，當在漢初。然今輯本尸子廣澤篇曰：「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純、夏、幬、冢、脍、販、皆大也」，辭出爾雅釋詁。尸佼著書，何由濫入爾雅之辭？

「爾雅成書，當在漢初」，這話已很難說，這裏也不必說。即就尸子廣澤篇論，實恐爾雅是抄尸子。爾雅釋詁的原文是：「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純、夏、幬、廌、墳、嘏、丕、奕、洪、誕、戎、駿、假、京、碩、濯、訐、宇、穹、壬、路、淫、甫、景、廢、壯、冢、簡、筓、販、脍、將、業、席，大也」。如係偽造尸子者抄爾雅，不應將詁爲「君」的「天、帝、皇、后、辟、公」改屬「大」，且爾雅說「大」的不止十餘名，而輯本尸子乃說「十有餘名而實一也」，好像未見過爾雅似的。必說辭出爾雅，其實甚有疑問。在本冊中收有金德建先生尸子作者與爾雅一文，是專就尸子作者與爾雅的關係立論的，以爲「宜即爾雅采自前此尸子」（頁二〇九），其立論正與孫先生相反。我們固知尸子不是尸佼所作，然據爾雅以證尸子，則在證據本身上還有問題的。孫先生的第（4）證說：

「仁義」之說，倡於孔孟。……梁啓超謂「義」爲孟子之專賣品，非憲言也。今尸佼乃商鞅之師，其年輩先於孟子，而書中乃「仁義」並重，何哉？

「仁義」本非孟子之專賣品，以此爲證，亦有問題。此在前面已爲申述，茲不復贅。

孫先生第（2）證與第（6）證也並非無研究的餘地的。因爲第（2）證是就「曾子之成書既晚，必非尸佼所克見」而言，孫先生以爲「設先秦已有曾子書，史還不能不言」。故斷定「其成書必甚晚」。但我們知道呂氏春秋勸學孝行兩篇並引曾子，我們實不好說「先秦古籍無道及者」。如就大戴記曾子十篇而言，兩戴記中的各篇多半是頗有問題，必須詳加考證乃能確定其時代的。孫先生謂：

今輯本尸子勸學篇引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

懼而無咎」，蓋出大戴禮大孝篇（懼而無咎，大孝篇作「懼而無怨」）。……又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臨事而懼者，鮮不濟矣」，乃撰曾子者剽竊論語述而篇孔子語。……今輯本尸子發蒙篇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又易曾子語為孔子語矣。抄襲譌誤，足證其偽。

尸子的「懼而無咎」，大戴作「懼而無怨」，比較進步。尸子發蒙篇的下文是：「易曰：「若履虎尾」，終之吉」。正恐其上文「孔子曰：「臨事而懼」，希不濟」，上句為引孔子語，下句乃尸子之語；與左傳莊八年的「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上句為引書語，下句為魯莊語，情形相同。纂戴記者，不明此種引書之例，乃誤為曾子語。在未確定戴記著作時代以前，其與尸子之關係，實當慎重地論定。至于第（6）證謂：

荀子倡「性惡」之說，又以「心」為人之主宰。……尸子責言篇……「故曰：心者，身之君也」，當即引荀子「心者，形之君」，尤非尸佼書之所克有也。

這是很合理的懷疑。尸子中像這樣可疑的地方正多，如分篇之極端重「分」，發蒙之言「名」，「分」，「是非」，都可以說是有晚出的嫌疑，但這些不是顛撲不破的證據。因為這些是就「思想線索」而言，「是一把兩面鋒的劍可以兩面割的」，必須與別的强有力的證據連起來，才能決定向那一面割去的。這第（6）證雖是很合理的懷疑，但在自身上並非不可動搖的。

孫先生的第（5）證確是很好的證據。在所舉五證之中，以這一個為最佳，但這一證仍不如第七第八兩證之不怕「特殊」的解釋。孫先生在第（7）證中引拙文後加以按語曰：

按張氏誤認現行尸子中有穀梁傳尸子之思想在內，誠屬非是，而此處之疑現行尸子非尸佼所著，尚足稱為有識，故取以佐證焉。

我覺得孫先生獲得一個可靠的憑據，說我「立論尚欠堅確」，「亦欠正確結論」，倒不打緊；而一則說我「結論更謂其中有穀梁尸子之思想」，再則說我「誤認現行尸子中有穀梁傳尸子之思想在內」，未免有一點「深文周內」。我的原文是說：「我承認穀梁傳上的尸子，在當日或確有其人，不過他決不是尸佼這人；現行的尸子上面，或者至少有他的學說思想在內。現在的尸子或者至少又有後人的依託部分在內」。在拙文草就之時，並未斷言穀梁之偽，自不敢斷言穀梁中之尸子為無其人，亦不敢謂確有其人；故連用「或」「或者」以示審慎之意，何嘗斷言其有？孫先生的文章作在拙著穀梁真偽考行世之後，且非不贊同拙考，亦說：

穀梁魯人也，尸子亦當為魯人，其名不可知，著書與否不可詳。亦未斷言穀梁傳中之尸子未曾著書。既不能質言其未曾著書，則我在當日說或者有其思想在內，這一種審慎的態度，我以為我們是可以有的。

孫先生的文章論陸賈新語部分，亦以新語爲僞，與拙見略相近，我是很願意見到孫先生所舉的例證之比我所舉的較多的。因爲所牽涉者非止拙文，我想在這裏不再多說了。

總之，考證老子也好，考證其他諸子也好，我想我們應當注意的是：盡量地檢查自己所提出的證據，以免增加許多無謂的糾纏。不要立異以爲高，不要什麼也「特殊」，問題總可比較早一點兒解決。

張西堂

二六，五，九。

自序

我在民國二十一年，編有諸子叢考一書，承顧頡剛先生的好意，列爲古史辨第四冊。顧先生所編的古史辨第五冊於二十四年出版，所以這本諸子續考便列爲古史辨第六冊。第四冊因印刷上的關係，止收印了通考及考據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所以擬議中的第六冊，以第四冊出版以後的通考及考據儒、墨、道、法四家的文字爲上編，考據名家以下的文字爲下編。那知擬議不能預合事實，書出至今，雖止短短的三四年，而這三四年中的考據諸子的文字，竟有意外的收穫。特別是老子年代的考據，以余所知，言之成理而持之有故者至有二十萬言之多。這樣不能不變更計劃，以通考及考據諸子者爲上編，考據老子者爲下編。上編先諸子通考，次各家分考，而同考一人一書者，則以論文的發表年代爲序。下編先方法論，次老聃考，次老子書考，次老聃及老子書合考。

關於研究諸子的計劃，已詳第四冊序文，茲不再贅。關於考據老子年代的文章，止第四冊及此冊所收，就有三十五六萬言，真是有點小題大作。不要說旁觀者望而却走，當事者也見而生畏。但老子的年代問題，究竟是需要解決的，除非將先秦的學術束之高閣，否則這個問題如不解決，一切都發生障礙。現在這個問題應當解決了，止是我不得遽下斷語，因爲我也是當事人之一。但我總希望能使讀者得到一個大體的輪廓，庶可據作他方面的研究。所以趁此搜集古今人的考據成績，提要鉤玄，略述於下；自己的一點愚見，也附帶提叙。俾讀者可以參校比觀，抽取合理的解說。

本來這個問題在西漢初年便已有了，司馬遷（前一四六——八六？）在他的史記裏，類集了道家、史家、以及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寫成了一篇老子傳。道家謂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史家則記孔子卒後百二十九年，太史儋即老子到秦國見秦獻公；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又謂老子的七世孫假仕於漢孝文帝，八世孫解爲膠西王卬太傅。如此叢脞參差的材料，使以「整齊百家雜語」自命的司馬遷，無法整齊，只好並存諸說。老子的年代，遂成了上爲孔子老師，下見獻公論霸的「蓋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了。

這樣矛盾共存的維持了一千二百多年，中間惟有北魏崔浩（？——四五〇）曾經懷疑。可惜其說已佚，止見於宋王十朋策問說：「至如疑五千言非老子所作，有如崔浩」（梅溪先生文集卷十三）。此外，唐韓愈（七六八——八二四）作原道說：「老

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但衛道有心，論辨無據。到宋代才在懷疑辨偽的空氣裏，有人起來研究考辨。以我所知，最早的要算陳師道（一〇五三——一〇一），在他的理究裏說：

世謂孔老同時，非也。孟子闢楊墨而不及老，荀子非墨老而不及楊，莊子先六經而墨宋次之，關老又次之，惠莊終焉：其關楊之後，墨荀之間乎？

次之，葉適（一一五〇——一二二三）在他的習學記言卷十五裏說：

言老子所自出，莫著於孔子家語、世家、曾子問、老子列傳。蓋二戴記孔子從老聃祭於巷黨云云，史佚子死，下殤，有墓：禮家儒者所傳也。司馬遷記孔子見老聃，嘆其猶龍。遁周藏史，至關。關令尹喜強之著書，乃著上下篇，言道德之意：非禮家儒者所傳也。以莊周言考之，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真人，亦言孔子贊其爲龍，則是爲黃老學者，借孔子以重其師之辭也。二說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然遷謂世之學老子則蝕儒學，儒學亦蝕老子。稱指必類，乃好惡之實情，烏得舉其所蝕而亦謂孔子聞之哉？且使聃果爲周藏史，嘗教孔子以故記，雖心所不然，而欲自明其說，則今所著者，豈無緒言一二辨析於其間，而故爲巖居川游素隱特出之語，何耶？然則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所謂老聃；妄人訛而合之爾。

又卷二十說史記老子傳：

序老子頗似鬼物，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何也？再次，黃震（寶祐四年，即西元一二五六年進士）在他的黃氏日鈔卷五十五裏說：
老子之書，必隱士嫉亂世而思無事者爲之。異端之士私相推尊，過爲誕誕。

陳師道據各書的稱引，定其年代在「關楊之後，墨荀之間」，最有見地。葉適雖謂儒——道兩家所述的孔老關係，「皆塗引巷授，非有明據」。但又說：「教孔子者必非著書之老子，而爲此書者必非禮家之老聃」。則似認爲有兩位老子，一是教孔子的儒家之老子，一是著書的道家之老子。蓋一則炫惑於老子的「隱見不常，而其子孫乃有名數至漢可考」；二則對儒道兩家所述的老子，希望找到合理的調和。結果祇有將一位老子，分爲兩位老子；而老子的問題，依然不能解決。至黃震並沒有舉出證據，止是籠統的懷疑而已。

認爲有兩位老子的，在宋代似乎還有人在。可惜姓名及文章皆佚，止在吳子良林下偶談的反駁裏，透露一些殘存的論證：

孔子適周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吾聞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虛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

告子者，若是而矣」。夫孔子以禮問聘，則聘非不知禮者，而聘之言如此，亦豈非禮之意，然而獨諱言禮，顧以為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蓋聘之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然使文而可廢，則意亦不能以獨立矣。此老子鑑文之弊，而矯妄過正之言也。或謂有二老子，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兼太史公老子傳多疑詞，既稱莫知其所終，又稱百六十餘歲，或二百餘歲；既稱太史儋即老子，又稱非也，世莫知其然否。意者有二老子，而太史公不能斷耶？余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經五千言之旨，其論理之意則是，其廢禮之文則非耳。太史公雖不能斷，然亦卒斷之曰，老子隱君子也。既曰隱，其年莫得詳亦宜矣。且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

這段文字，前半指出老子書的非禮，與孔子的問禮衝突；後半指出「絕滅禮樂之老子，與孔子問禮之老子不同」。關於前者，吳子良的反駁謂老聘對於禮，「尚其意，不尚其文」。惟其尚禮之意，所以以禮告孔子。惟其不尚禮之文，所以有「鑑文之弊，而矯枉過正」的反禮的言論。關於後者，吳子良的反駁謂「老子所答問禮之言，即是道德經之旨」。換言之，答孔子問禮的老子，就是著道德經五千言的老子。前後兩說，應當同出一人。惟吳子良述後說之前，冠以「或謂」二字，又有出於二人的可能。果爾，懷疑老子年代者，可知大不乏人。

吳子良對前後兩說，雖都有反駁，但並沒有堅固不拔的見解，止是覺得「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後二千餘年，將何所據而斷耶」？然則他的反駁的論證，不過是爲了坐實不能據斷而已！

此外，李觀（一〇〇九——一〇五九）策問說：「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爲孔子者，習聞共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佛之說不詳。曾子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信；禮記、經之屬也，亦有妄乎？明辨之，無牽舊說」（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二十九）。雖似以禮記爲經，不容有妄，但望對者「無牽舊說」，顯係對舊說懷疑。王十朋（一一一〇——一一七一）策問也說：「夫子之始末，莫詳於世家。抑嘗讀之矣，而未免乎疑，庸可以不辨？子嘗適周矣，及其施（蓋旋之誤）也，老子以言送之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老子之言，似不徒發，必有以箴夫子之失。使夫子果有此失，豈足爲聖人乎？此不免乎疑也」（梅溪先生文集卷十四）。朱熹（一一三〇——一二〇〇）策問也說：「禮經記孔子之言，有得於老聘者，亦與今道德上下篇絕不相似，而莊生之言，則實近之，皆不可曉。敢請問於諸君焉」（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王十朋懷疑孔子的問禮老聘，朱熹懷疑老聘的教訓孔子。李、王、朱三人既都以此策問士子，可見老子年代及與孔子的關係，在當時亦由懷疑而成了學術界的重要問題了。

不過，李觀、王十朋與朱熹都沒有明文論次，陳師道的論證極簡，葉適與佚名者的分爲兩位老子，又很難得到學術界的同情。反之，吳子良所說的「太史公去周近，尚不能斷，俊二千餘年，將何處據而斷耶」？却正合一般人的懶於探討問題，主張「存而不論」的心理。由是老子的年代問題，遂又矛盾共存的維推了八九百年（中間也許有人懷疑，知後補錄），到清代才又在考古求是的空氣裏，有人起來研究考辨。以余所知：

（一）畢沅（一七三〇——一七九九）在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作老子道德經考異序，據說文「聃、耳曼也」。「聃、垂耳也」。「聃、耳大垂也」。又說文「南方聃耳之國」，大荒北經、呂覽俱作儋耳，淮南王書作聃耳。斷定聃、儋、聃「三字相同，故並用之」。這當然是在證明「儋即老子」。但又引莊子云：「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往見老聃」。「孔子南之沛，見老聃」。據謂「是孔子問禮之老子，即著道德經之老子，不得以其或在沛或在周而疑之」。則雖謂太史儋即老子，而又承認孔子的問禮老聃，或者真的相信老子活了二百餘歲，亦未可知。

（二）汪中（一七四四——一七九四）的述學補遺中有老子考異一篇，說老子有可疑者三點：

- 一、孔子問禮於老子，而老子書說「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 二、周楚聲教中阻，楚人仕周頗可疑。
- 三、身為王官，不得稱隱君子。

由是進而說老子的年代很晚。證據是：

- 一、與關尹同時的列子被殺於孔子沒後八十二年，為關尹著書的老子年世可知。
- 二、文子精誠篇引老子以秦、楚、燕、魏並稱；燕終春秋之世，不通盟會，魏之建國距孔子之歿凡七十五年。
- 三、列子黃帝篇載老子教楊朱事，楊朱篇述子貢之世的端木叔，說苑政理篇又稱楊朱見梁王；楊朱為老子弟子，而及見子貢之孫之死，及見梁之稱王，則老子不能與孔子同時。
- 四、函谷關置於獻公之世，老子之子宗當秦昭王時，知「遂去至關」的老子是秦獻公時人。

本傳說太史儋即老子，其言極是。汪中與畢沅同樣主張太史儋就是老子，但畢沅相信孔子的問禮老子，汪中否認老子的與孔子同時。所以畢沅是將老子的年歲拉長，汪中是將老子的時代拉後。

（三）崔述（一七四〇——一八一六）在他的洙泗考信錄卷一裏，力辯孔子問禮於老子之說。他認為此說的來源，由於「戰國之時，楊墨並起，皆託古人以自尊其說。儒者方崇孔子，為楊氏說者因託諸老聃以誣孔子」。他的證據是：

- 一、孔子並不「驕氣與多慾，態色與淫志」，知「謂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

妄也」。

二、「孔子稱述古之賢人及當時卿大夫，論語所載詳矣」，並沒有稱及老聃，知「謂孔子稱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

三、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經中，且年僅十三，不應亦不能從孔子適周。明年孔子已不在魯，已無君可請，知「謂敬叔從孔子適周而魯君與之車馬者，亦妄也」。至道德經五千言，「其文亦似戰國諸子，與論語春秋傳之文絕不類」，「要必楊朱之徒所僞託」。但對老聃的年代，他仍信在春秋末年，所以說「老聃在楊墨前」。

（四）牟廷相在道光丁亥（一八二七）作繹老序，認為老子的年壽是極長的。周語幽王二年，伯陽父知周將亡，史記周本紀謂之太史伯陽，老子傳謂李耳字伯陽，知伯陽父即老子，當幽王初年。儋聃聲同，知太史儋亦即老子，當秦獻公時。在周稱伯陽父，至孔子時稱老聃，見秦獻公時稱儋，前後並為三百八十年。但老子書的著作年代，則當在去周入秦之歲，即孔子卒後一百二十九年。理由是本傳言「老子之去周至闕，闕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於是老子乃著上下篇」。又孔子稱老子述而不作，知孔子時，老子未嘗有所作書。孟子闢楊墨不闢老，聖伯夷柳下惠而不言老子，知孟子時，老書初出，未有盛名於天下。荀子天論才說，「老子有見於詘，無見於信」，知荀子嘗見其書了。

（五）康有為（一八五八——一九二七）在桂學答問裏說：「各子書雖老子、管子，亦皆戰國書，在孔子後，皆孔子後學」。

清人的考據自然比宋人進步多了。但畢沅雖證明了「儋即老子」，却無補於老子的年代問題。崔述雖否認了孔子的問禮老子，又說老子書是楊朱之徒所僞作，却仍承認老聃是春秋末年人。止有汪中的考辨最為詳贍，論斷最為明確。但在積極方面雖找到了老在孔後的證據，消極方面却没有駁正了老在孔前的文獻。至牟廷相治絲益棼，於老聃太史儋以外，又加上伯陽父的糾纏，使老子的年歲由二百加到三百八十。康有為止有老子書在孔子後的意見，並沒有證據，更當然沒有力量了。

大概是基於上述的考據老子年代的證據貧乏，同時也是由於舊說的人人者深，所以老子仍能安然的做孔子的老師，安然的享受先秦各家都出於道家，即都出於老子的榮譽。民國八年，胡適之先生中國哲學史大綱，仍依舊說。至十一年，梁任公先生作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始提出六條證據，斷定老子書的著作時代在戰國之末。老子的八代孫，與孔子的十三代孫同時，是第一件可疑。孔、墨、孟都沒有稱及老子，是第二件可疑。曾子問所載老子的談禮，和老子書相反，是第三件可疑。史記老子傳本於莊子，莊子是寓言，不能看作歷史譚，是第四件可疑。老子有許多太激烈太自由的話，不像春秋時人說的，是第五件可疑。老子書的「王侯」、「侯王」、「王公」、「萬乘之君」、「取天下」、「仁義」等字樣，也不像春

秋時所有，是第六件可疑。

梁先生的名望既高，所舉的證據又確鑿，所批評的又是胡先生的名著，所以其說一出，學術界大為震動。梁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一年十一月十三至十七日的晨報副鑄，隨後便有張怡蓀先生（煦）的梁任公提訟老子時代一案判決書，在同年同月的二十二至二十四日的同一副鑄發表。針對梁先生的文章，逐條反駁：

一、自孔子至漢景帝四百一十年，老子縱不是活了幾百年，但總在百年左右。

百年左右的老子之子孫，歷世九代，可有四百年。孔子二十歲生伯魚，其後十三代皆不永年，定皆早年得子。所以老子八傳至解，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並不奇怪。

二、論語中的「竊比於我老彭」，老即老子。又「以德報怨」，此文見於老子。

三、以尼采做例，曾子問的老聃拘謹守禮有何問題？

四、未駁。

五、認為可不置駁。

六、在對老子原文或改竄未下改訂以前，不能以文字定時代。

結果判決「梁任公所提各節，實不能絲毫證明老子一書有戰國產品嫌疑」。

但有人反駁，也有人贊成。最早是顧頤剛先生在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與錢玄同先生書云：「老子決當如梁任公先生說，是戰國末年的書」。於梁先生舉的證據外，又舉出兩個證據：其一、老子是「經」體，同於墨家的墨經，荀子所引的道經，韓非子內外儲說之經；戰國前期，不會有此類著作。其二、老子痛恨聖智，實在因為戰國後期，社會上受游士的損害重極了，才有這種呼聲。在春秋末年及戰國初期，也是不會有的（見古史辨第一冊頁七三）。同年夏秋間，錢賓四先生（穆）作關於老子成書年代之一種考察，就老子開宗明義的「道」與「名」二字，論其思想系統。關於「道」一方面，「論語言道，僅言人事」，「墨子言義不言道」，「至莊子論道，乃與老有同樣之見解」。然有的道字「與論語素樸之義為近，與老子深遠之旨為遠。則莊生言道，明為孔墨與老子之過渡」。關於「名」一方面，「孔子首言正名，然其所指不過君臣父子間之名分」，「墨辯論名，乃指凡名實之名」。至「莊子則謂名字言說均不足以言真理」，其意「不過為儒墨兩家作一調人」。「至老子則息爭之事匪急，而認道之心方真……故曰「道隱無名」」。所以「老子後於莊子」（見燕京學報第八期）。至十六年，張仁父先生（壽林）也徵引了畢沅、汪中、崔述諸人的考訂，及衛聚賢先生的「于」「於」用作介詞統計表，寫了一篇老子道德經出於儒後考，斷定「老子著作之時代，當在孔子之後，約在孟子之前後也」。十八年六月，劉澤民先生（汝霖）出版周秦諸子考，說教孔子者是老聃，輯老子者是李耳。老聃「說了許多格言，却没有書行世」。至戰國的李耳始編輯成書，所以「就帶了戰國時代的色彩」。史記混為一人，「就成了千古疑案」。

至我自己也是相信老在孔後的，並且認為老子就是太史儋，在孔子後百餘年。

老子書的被推在孔前，由於老子人的被推在孔前。所以考據老子，不能祇是考書，更應進而考人。十六年，草戰國前無私家著作說，對老子的成為孔子之師，考知是道家的推崇本宗，排軋儒家。正同於後來佛家盛行，道家造老子化胡經，說釋迦是老子的弟子。實則老子就是太史儋，除畢沅、汪中所舉的證據外，還有三個證據：

一、老聃為周柱下史，太史儋也是周之史官。

二、老子出函谷關，太史儋入秦也必出函谷關。

三、老子八代孫不能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太史儋的八代孫則正可與孔子十三代孫同時。

十八年，到河南大學講諸子概論，又本此說，進而分析史記老子傳的來源，知載孔子請教老子，取材於道家；太史儋見秦獻公，取材於舊史；老子世系取材於老氏家譜或老子後人的傳說。證明「或曰儋即老子」，是舊史或老氏後人之說；「或曰非也」，是道家之說。二者相比，當然前者可信，而後者是道家的把戲。二十一年，編印古史辨第四冊，附了一點關於老子書是專著的考訂，題名老子及老子書的問題，收印在內。

主張老子晚出的文章既多，主張老子在前的文章也隨之產生。一是唐立先生（蘭）的老聃的姓名和時代考，一是黃方剛先生的老子年代考。唐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八年十二月及十九年一月的天津商報文學周刊。說曾子問屬於儒家，而所載「老聃對孔子的語氣，和莊子相合」，知確是「老聃比孔子長，孔子曾學於老聃」。莊子天下篇和韓非子內儲下六微所引老聃的話，都見於道德經，知「老聃就是道德經的著者，至少是其中一部分的傳授者」。「道德經是老聃的遺言」。至史記的老子世系是假的，至少也是有錯誤的。老子書中的非禮與曾子問的談禮，是「思想變換」。

黃先生的文章發表在十九年七月出版的哲學評論第二卷第二期。據孔子家語、列子、戰國策、呂氏春秋、淮南鴻烈、韓非子及莊子所引老子語，「考訂老子書之年，至遲當於莊子生時已傳於世」。至作者，則據戰國策、韓非子、呂氏春秋、淮南鴻烈及賈子新書，知是老聃。老聃是老彭，不是李耳；史記本傳不能據考年代，其年代可由論語求之。所以老子長於孔子，老子書成於孔子存時。

考據老子年代晚出的文章雖不少，證佐亦泰半確鑿，但止是單篇論文。我所作雖放在我所寫的諸子概論，且大膽的先叙以孔子為首的儒家，次叙以墨子為首的墨家，然後再叙以老子為首的道家，但沒有出版。單篇論文每被視為意見，不視為結論，所以不能成為嚴重的問題。成為嚴重問題，要始於馮芝生先生（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的將老子放在孔、墨、孟之後。馮先生一方面採劉澤民先生之說，分老聃與李耳為二人。一方面以一則孔子前無私人著述，二則老子非問答體，應